

一個中國大陸人 究竟怎樣才能在硅谷立足?

2019年9月19日,Facebook 硅谷總部園區,38歲的中國工程師陳勤跳樓身亡,警方認定為自殺。隨後,Facebook 的考評機制、企業文化以及華人在整個硅谷的生存狀況成為了全民關注的焦點。

在此後的兩個月中,我們先後採訪了多位在硅谷工作的華人,試圖在陳勤事件的背後找到一個問題的答案——一個中國人,究竟怎樣才能在硅谷立足?

到硅谷去
好窮好破——這是王碩對硅谷的第一印象。2016年,他從國內來硅谷讀碩士,剛下飛機,看着車窗外,覺得這跟西二旗沒有太大區別,“都是稀稀拉拉的大平房,绿化做得也不好,破落荒涼。”

但這並不影響王碩對這裏的向往——這個被舊金山灣和太平洋山脈包圍的長約25英里的狹長地帶,一個世紀前還是一片果園,隨著英特爾、蘋果、谷歌、臉書、雅虎等互聯網與科技巨頭的人駐,這裏變成了“聖地”,“作為學計算機的人,硅谷永遠是一個類似聖地的存在,所以總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還是要過來看一看。”王碩說。

來硅谷唸書前,王碩在國內工作了兩年,在互聯網大廠和創業公司都待過,很累,每天都是晚上10點之後才離開公司,壓力一層層傳下來,總有工作做不完的緊迫感。

他輕易地看到了自己未來5年、10年的發展路線,“在五、六家頭部公司里,三年內跳一次槽,年薪漲到六七十萬,職級類似阿里和百度的p6,或騰訊的3.1。時刻關注房市,一心想攢錢,在北京的四環外買個小房子,組個家庭,生個孩子,每天晚上十點才回家,小孩出生的前半年都不會認識爸爸,而你的負擔越來越重的時候,你哐一下,到了35歲,開始遭遇年齡歧視,面臨被淘汰,這些都是我在國內那兩年看到周圍同事所經歷的狀況,這樣的路線對我來說太灰暗。”

他決定來硅谷,先用工作這兩年攢的錢讀個碩士,然後再去 Google 或 Facebook 這樣的大廠工作——對王碩來說,這種未來至少是一種可能性的嘗試。“去硅谷,對於學 CS(computer science 計算機科學)的人來說總歸是 nothing to lose,大不了將來再回來。”

去硅谷,這是 CS 的畢業生再自然不過的選擇。在這盛傳的一個調侃是,在硅谷,一個招牌掉下來砸10個人,里頭三個 Facebook、五個 Google,其他兩個是在 startup(創業公司)。但除了“聖地”的光環,越來越多的華人來到硅谷,還有現實的考量。

據統計,硅谷目前的科技公司數量超過1500家,這意味著這裡能提供給外來者的工作機會遠超於美國其他城市。“說白了就是,你在硅谷找不到工作,你在美國其他地方也很難,因為這裏的工作實在是太多了。”

在硅谷,科技公司提供的起薪通常在12萬美元左右,這幾乎是非互聯網、科技公司的兩倍。除了工資還有股權、獎金和其它福利,這意味著你可以和合租一個前有草坪後有游泳池的公寓,周末去滑雪,學開飛機,請年假去世界各地旅行打卡。

如果以家庭為單位,男女雙方若都在硅谷的互聯網大廠工作,初始年薪合起來就能達到將近30萬美元,三年之內就可以一起貸款買房,在美國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。

這些肉眼可見的優勢也使得大量非 CS 專業的中國學生在碩士階段轉學 CS——畢竟,這被認為是當下最容易留在美國的專業。特別是對於從文科專業轉向 CS 的學生,他們還可以獲得更好的簽證政策。

在美國讀書的留學生,畢業之後學生簽證將換成 OPT 實習簽證,而 OPT 簽證會對不同專業的學生區別對待——

對於 STEM(科學、技術、工程和數學領域)專業的學生,OPT 簽證有36個月的有效時間,這期間,每年4月,你都可以參加 H1B 簽證的抽籤。H1B 是美國最主要的工作簽證類別,發放給美國公司僱傭的外國籍有專業技能的員工,持有 H1B 簽證者最多可以在美國工作6年,這也意味著你將獲得排隊等綠卡的機會,在美國,華人的綠卡排期通常在6年左右。

而對於非 STEM 專業的人,例如文科商科,OPT 簽證只有12個月的有效期,也就是說他們只有一次機會抽 H1B,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們留在美國的難度。

童瞻在美國讀的專業是公共健康,畢業後,他選擇回國在 NGO 工作過幾年,收入低,越待越壓抑,再加上女朋友還在美國,27歲那年,童瞻決定來美國念 CS。在他看來,這是他能留在美國的最優選擇,工作機會多,工資也高,簽證還有優待。

這一次,和絕大多數學 CS 專業的中國學生一樣,他的目標也是硅谷——從零基礎變成合格的大廠碼農,對於沒辦法投資移民、又想移民的人來說,這幾乎是最容易留在美國的路徑。

“上岸了”
在硅谷,人們找工作的首選大多是 FLAG (Facebook, LinkedIn, Apple, Google),找到工作通常被形容為“上岸”,而“刷题”則是確保你能夠順利上岸的一個重要路徑。

硅谷是從2012年開始大規模刷题的,因為計算機行業的迅猛發展,人都涌來了,為了能更高效地篩選人,考算法題這種“應試”面試環節,逐漸被所有的互聯網大公司納入面試體系。

在硅谷的互聯網公司,80%的面試內容都在考察算法,準備大公司面試也主要是刷算法題。

通常,在簡歷過關後,會有40分鐘左右的電話面試,瞭解背景後對方會問幾個技術問題。電話面試一個星期之內會通知是否有現場面試,現場面試一般有5-7輪,都在45分鐘左右,有的環節是上機的算法面試,有的環節是面試官描述問題背景,需要自己抽象出問題和數據結構,然後給出解法。

儘管都是算法面試,但各家的風格都不太一樣,Facebook 的題難度適中,主要是看規定時間,儘可能不出錯地考高分,Google 的考題則可能會非常難,主要考驗的是面試者解決問題的思路。在 Google,面試官會直接讓你在白板上寫算法,邊寫邊解釋,考察算法能力的同時還考察溝通能力。



刷题網站的出現,甚至改變了很多碼農就業的命運,進入 FLAG 不再遙遠。

Leetcode 是一個在線刷题網站,這裏的題庫從各大公司的真實面試中流出,被放在了網站上。最近幾年,Leetcode 的題庫從最開始的一兩百多道擴充到了上千道,如果想要更有效率地刷题,你需要支付160美元,這上千道題將被分為話題 tag 和公司 tag,還附有這道題被面試問到的頻率。

刷算法題是準備硅谷大廠面試中最重要的一步,也是最耗費時間精力的一步。

作為碩士轉讀 CS 的學生,童瞻從去年5月到今年3月,陸續刷了一年的題。這期間,他一度感覺自己的焦慮快到了嗓子眼,刷到不會做的題時,他就撓頭,看答案也不懂的時候,繼續撓頭,最後還是弄不明白,整個人就癱在椅子上。那段时间,他時常垮着臉,一度覺得自己很抑鬱,每天睜開眼就賴着不想起床刷题,無意義地刷手機。

刷题的日子看上去沒有盡頭,存款也在嘩嘩地減少——房租800美元、學費一萬六,再加上生活費,人民幣破7的時候,童瞻曾經因為刷了一下匯率,連着兩個晚上沒睡着覺。最後,臨近面試時,童瞻一咬牙花幾百美元報了一門算法班的網課——這種學校相當於算法班里的新東方,課程持續兩個月,每周兩次課,晚上會有老師上線講解例題,課後有配套的刷題作業。

在硅谷,熱衷擅長刷题和開培訓班的,除了中國人,還有印度人。Youtube 上的算法教學視頻,很多博主都是印度人。模擬算法面試的軟件,系統配對,釋放兩道算法題,一道是你面對方,一道對方面你,使用者也以中國人和印度人居多。在一個類似豆瓣的 app 上,印度人也會經常發佈“教你如何寫代碼/編程/面試”的同城活動。一位刷了半年題最終進入 Google 的中國女孩說,“市場要求你成為這樣的人,所以大家都會努力去成為這樣的人,才能賣個好價錢。”

在硅谷互聯網大廠的外籍工作者中,華人和印度人的數量最多,他們也是刷题最大的受益者。從規則上來講,刷题只是努力的問題——如果三個月刷題沒刷到工作,那刷一年或許就可以拿到 Google 或 Facebook 的工作了。

事實似乎也是如此。在畢業前的兩個月,童瞻拿到了大廠的 offer。一年之前他曾投過該公司但失敗了,但這次,他“上岸了”。

競爭

由於路徑清晰可見,也使得一些人產生了一種“不過如此”的感覺,“有的在國內已經工作過幾年,聽朋友說這邊賺得多,來這邊水一個碩士,刷刷題就能進大廠,於是他們就來了”。童瞻現在的同級同事中,就有這樣的人。但現實中,這種集訓的、應試的學習模式,有時候也會遇到問題——儘管刷题能刷過面試,但一進公司面對競爭會立刻掉隊,被 PIP (“績效改進計劃”),也是大家公認的解雇前的通知,或者被解雇。

在硅谷的大廠工作,有着非常光鮮的一面。

方曉飛在 Facebook 工作了快三年,他喜歡這裏。工作日早上9點半開鈴一響,他會起床趕去公司吃早餐,從家到公司,開車只要20分鐘,這讓他時常和國內對比,以前在騰訊實習的時候,單程通勤就要一個小時。

硅谷的科技公司一般都沒有打卡制度,因為打卡被認為會降低員工的士氣。公司還會匿名統計員工的滿意度,包括工作中“喜歡的內容”和“擅長的內容”,各組會相互比較,不滿意員工就會跳槽或自由換組。此外,公司每周都有講座和技術沙龍,關於 AI、智能醫療、無人車新浪潮等各種主題。還有21天的帶薪年假,方曉飛每次都很開心的打開世界地圖,搜索自己想去的地方,把目的地物價換算成美元,去哪裏都覺得是一件小事。這些都讓他覺得很滿足,“我來硅谷,就是和世界上這些 IT 人才一起工作。我覺得這一輩子,就是圓一個夢吧。”

但寬鬆的制度並不意味着同樣寬鬆的結果。Facebook 曾是硅谷最受員工歡迎的公司,但它同時也被認為是整個硅谷壓力最大的公司。

“比如說你寫了多少行代碼,你提交了多少次代碼,這些全都是公開的信息,大家都可以查到。所以說你大概比較一下,就知道自己是不是評分最低,看你差多少,有沒有達到期望。”這也是方曉飛最大的壓力來源,“你看別人在你旁邊,喇喇地寫了很多東西,心裏面肯定會很緊張。”

方曉飛常看到的同事下午四點多就下班回家了,但這些人會在晚上突然提交代碼,因此,儘管沒有打卡制度,但同事之間的競爭也使得員工出于主觀意願而加班。

“周三是公司規定的 work from home 日,很多人在家辦公,對於想偷懶的人來說,理論上一周只上四天班都可以,但我還沒見到過真正在家休息的人,身邊人各自手頭的項目每周都有穩定進展。”方曉飛的一位同事說,他甚至還聽說過曾經有同事主動提出降級,雖然收入降低了,但是工作壓力會減小,從而獲得生活的空間。

此外,出色的溝通能力也是在硅谷大廠立足的重要因素,而這恰恰是擅長隱忍的中國人所不擅長的。

方曉飛在人職 Facebook 的半年內就晉陞了,但那次後,他已經快兩年沒有陸職,至於理由,部門領導表達得直截了當,“他就覺得我溝通不行。”當時,方曉飛同一時間要做很多項目,和很多人溝通協調,有一些沒溝通好,遲了交接,影響了其它團隊的進度。

方曉飛很沮喪,“你要想儘快陸職,我的理解是,你不能有短板,各方面都要達到公司的晉陞標準,還得持續半年一年的時間表現好,一旦出現些短板就不大好。”他決定彌補自己的弱項,申請換組,去了一個十分重視溝通的組。

現在,他會第一時間把覺得重要的消息通知給大家,當前項目什麼進展,什麼時候交接,可能存在的問題。遇到問題的時候第一個站出來去溝通解決,“就想讓大家都知道,這個人非常靠譜,只要有問題找他就能得到解決。這也是一個高級工程師需要具備的素養。”

“上岸”後的童瞻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。“我這種性格在國內的評價是,這孩子比較文靜,好詞兒,在美國就是太 quiet,應該更 open。不表達,別人就認為你沒有需求。”

除了溝通,在硅谷工作的中國人還需要面對的另一大難題是——同印度人的競爭。

“在硅谷,印度人和中國人是最主要的競爭對手。”一位在美國生活了12年,如今在 Facebook 工作的華人工程師說。在他看來,美國的移民種族中,中國人和印度人最像,都是屬於不愛惹事兒,做技術工作,喜歡給孩子更好的教育,喜歡買房子,喜歡攢錢。“也就是因為像,所以產生了競爭。”

在他的印象中,硅谷90%的技術移民都是印度人和中國人,其中,印度人的數量要遠超中國人,再加上英語是母語,且更擅長溝通,因此硅谷大廠中的身居要位的印度人數量也明顯高於中國人。

覺得硅谷看起來和中國二旗差不多的王碩在硅谷發展得還算順利,他從到美國讀書的第一天就開始刷题,CS 碩士畢業後順利地進入大廠工作,關於中國人和印度人的競爭,在他看來,最直接的體現是在面試中,如果遇到印度的面試官,“即使中國人面試面得很好,也會給低分。”

據他瞭解,中國人因此吃了不少虧,但這種狀況近年來正在改善,因為,“我們這一批90後在跟印度人的對抗當中正在變得強勢。”

最大的恐懼

對於在硅谷“上岸”並希望留在美國的中國人,壓力與競爭並不是最令他們焦慮的,他們最大

的恐懼是——“溺水”,即失業——在美國,沒有綠卡之前,無論你是持有 OPT 實習簽證,還是 H1B 工作簽證,一旦失業,你必須在60天內找到工作,否則就面臨被遣返的命運。

每年,美國政府會向外國人發放共8.5萬個 H1B 工作簽證,在2013年之前,由於經濟危機等原因,獲得 H1B 簽證只需申請,並不需要抽籤。但由於申請人數越來越多,從2013年起,H1B 簽證改由抽籤的方式發放。其中,有2萬個名額面向擁有美國大學碩士及以上學位的高學歷申請人,高學歷者如果沒能在2萬個名額中被抽中,將被並入6.5萬個普通名額,進行第二次抽籤。

近年來,抽中 H1B 簽證變得越來越難。據美國《世界日報》報道,從2015到2018會計年度,H1B 簽證首次申請的拒籤率從6%升至24%,且拒籤趨勢仍繼續升高——在2019年 H1B 的抽籤中,有超過19萬人申請,其中有美國碩博士學位的申請人抽籤命中率約為51%,其他申請人的命

中率為38%。也有人三次連續沒有抽中 H1B 簽證,最後選擇回國。

而在 H1B 的抽籤中,中國人的中籤率遠遠低於印度人。有數據統計,2017年的8.5萬個 H1B 簽證,69%給了印度人,中國人所佔的份額為12%。

當獲得 H1B 簽證越來越需要運氣的加成時,對那些持有 H1B 簽證,正在排隊等待綠卡的中國人來說,一旦失業,就將意味着你此前所獲得的運氣與付出的努力,很有可能全部作廢。

很多在硅谷工作的中國人都感覺自己被簽證束縛住了。同一家公司,美國同事覺得工作節奏太緊張,決定裸辭,然後去休息旅行一段時間。但中國人大多不敢,“我一旦失去雇主的話,我的 H1B 簽證60天就失效了。就覺得自己還是被一條無形的鎖鏈鎖住了。”

有的人厭倦了在大廠做一顆螺絲釘,在小的創業公司看到了更喜歡的項目,但也不敢輕易跳槽,一旦創業公司創業失敗,失業很可能會令他們直接“溺水”。還有的人在公司在遭遇職場霸凌,氣不過時也想過大不了的要求,架離職,但沒辦法,請一天假,第二天還是硬著頭皮上班。

也有人會安慰自己,失業並沒那麼恐怖,在被遣返前尚且還有好幾條路徑可以自救。

例如,選擇重回學校去讀個學位,從實習簽證開始重新抽取 H1B,或者去外包公司(ICC),等待翻身的機會。

外包公司通常被認為是留在美國最差的選擇。這些外包公司通常是印度人開的,他們接大公司的項目,提供合同的工作,可以確保你的 H1B 簽證繼續有效,但相應的,你的工資會被砍掉一半,壓到6萬甚至更低。很多人將此舉視為權宜之計,但也必須在此期間接受明目張膽的壓榨。

一位已經拿到了綠卡的硅谷華人工程師至今仍認為,等待綠卡的那幾年是他人生中最煎熬的時候,不敢頻繁回國,怕失業,不敢去創業公司,怕在工作中起衝突,也不敢給自己一段空檔什麼也不做。“儘管有了綠卡之後,這些事情也不一定就會去做,但有選擇和沒有選擇始終是兩種狀態。”

選擇
儘管每個人都曾面臨着“溺水”的壓力,但留在硅谷——仍是絕大多數人的答案。

硅谷龐大的華人數目使得他們很少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少數族群。

王碩覺得自己來美國依然過的是純中國式的生活,和中國人住在一起,除了在公司、學校,上班、上課的時候用英語之外,其它沒什麼差別。“中國人所需要的任何配套設施都很完善,使我們能夠軟着陸,並沒有太多地受到美國文化的衝擊。像我這樣對融入美國這事並沒有很感興趣的人,可以很順暢地過着類似國內的生活。”王碩只吃中餐館,但在硅谷,上海菜、粵菜、川菜、湘菜、火鍋都有,“口味的話跟北京比,就打个八折吧,也夠吃了”。買東西去中國超市,包括螺螄粉在內的國內能買到的東西,這裏也都有。

車會看紅綠燈,會主動避讓行人,無障礙設置也做得好,也沒一羣人關心你的工作和婚姻,童瞻喜歡這裏的自由和尊重。儘管他也有時候也會苦惱,這裏沒有發小,不能很好的照顧父母,如果有了小孩會遭遇更多問題。但他還是決定先不想這些,“得先把綠卡搞定了,才有資本談別的事”。

為了能更好地待在硅谷,方曉飛還在努力地改善自己的“溝通問題”。每周公司都會有些小聚會,大家圍在一起喝酒,站着聊天,他會逼着自己參加這些社交,把它當作工作的一部分,看到有同事聚在那兒,一定要走過去,參與對話,就像他當時上英語課給自己的要求。和童瞻一樣,他最害怕同事們聊橄欖球比賽,因為,“真的沒法聊”。

每次聚會,方曉飛從來沒有在最後離開過,隨時都想走,只是會逼着自己多待一會。“如果這是在國內,我可以站在這裏吹一個小時,但是在這裏,可能站十分鐘,就已經不錯了。”

因為還沒有在美國組建家庭,方曉飛並不拒絕回國的選項,他覺得如果哪天的互聯網大廠不用天996,工資也不錯,說不定自己就回去了——對於很多享受硅谷生活的年輕華人來說,這是必須具備的心態——留在硅谷很好,但回國也不是不可接受。

劉航就選擇了回國。從硅谷的一個小創業公司離職後,她經歷了一段瘋狂刷题的時光。

那段時間,她經常哭,每天頭頂都懸浮着一種非常巨大的不確定感。她開着車,一個小時就能到海邊。都是山路,拐着彎往上,沒有路燈,開到哪,地上的反光片會反光,眼前只有那一點點光亮,眼睛也就專注的盯着那一點亮。

到了海邊,淚水早就干了。四周一點燈光都沒有,海浪拍打着岩石,岩石立在黑暗中,因為太黑了,連自己的手指都看不到,也看不到大海,只能夠聽到海浪聲,還有海的腥味。她覺得自己特別渺小,靠聽巴赫的《哥德堡變奏曲》重建生活的秩序感。

最終,她拿到了 Google 北京分公司的 offer,周圍有人勸她,股票太低了,回北京不划算,而且回國之後,很難再回來,但她最終還是決定回國。

劉航說,對拿綠卡這件事,她並不執着,只是覺得這像是個悖論,“你覺得那是通往自由,但你是犧牲了你在未來10年時間的自由,這麼寶貴的時間,犧牲掉很多其他地方的機會,我更願意過的生活是,我要到每個國家都看一看,都去生活一遍”。



的恐懼是——“溺水”,即失業——在美國,沒有綠卡之前,無論你是持有 OPT 實習簽證,還是 H1B 工作簽證,一旦失業,你必須在60天內找到工作,否則就面臨被遣返的命運。

每年,美國政府會向外國人發放共8.5萬個 H1B 工作簽證,在2013年之前,由於經濟危機等原因,獲得 H1B 簽證只需申請,並不需要抽籤。但由於申請人數越來越多,從2013年起,H1B 簽證改由抽籤的方式發放。其中,有2萬個名額面向擁有美國大學碩士及以上學位的高學歷申請人,高學歷者如果沒能在2萬個名額中被抽中,將被並入6.5萬個普通名額,進行第二次抽籤。

近年來,抽中 H1B 簽證變得越來越難。據美國《世界日報》報道,從2015到2018會計年度,H1B 簽證首次申請的拒籤率從6%升至24%,且拒籤趨勢仍繼續升高——在2019年 H1B 的抽籤中,有超過19萬人申請,其中有美國碩博士學位的申請人抽籤命中率約為51%,其他申請人的命